

卢森堡

论文学



卢森堡

论 文 学

王以铸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Rosa Luxemburg
Über Literatur

论 文 学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146,000 开 本 850 × 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6 $\frac{5}{8}$ 插 页 2

1983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3 年 1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16,500

书 号 10019·3390

定 价 0.63 元

译者引言

对于了解一些现代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读者来说，卢森堡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在国际上以无产阶级的杰出领袖和斗士而知名。她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她的作品是马克思主义德语文献中一个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应当指出的是，卢森堡其实并不是德国人，就好象居里夫人不是法国人那样，她们都是波兰民族的优秀女儿，后来分别在西欧的革命运动和科学界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罗莎·卢森堡一八七一年三月五日生于沙俄统治下波兰卢布林地方一个犹太人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商人，但他并不象一般犹太人那样狭隘和保守。他家讲的不是犹太话而是波兰话。母亲也有很高的教养。卢森堡一家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好，有时甚至衣食难继。她少年时的困苦生活，加上她作为波兰犹太人所处的受歧视地位，使得她从小就对人间痛苦有深刻的体会，能接近劳苦大众，同他们有共同语言并对他们寄予深厚的同情。

卢森堡自幼聪明伶俐，很早就开始读书识字。她随家庭迁居华沙后，考入了这里著名的第二女子中学，成了该校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毕业后她参加了这里的一个地下革命组织，后因被警方发觉，不得不一八八九年亡命国外，逃到了瑞士的苏黎世。

苏黎世当时是亡命的俄国和波兰革命者集中的地方。卢森

堡在这里的苏黎世大学继续求学，从事革命活动并结识了不少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约吉希斯等人。她在苏黎世最初研究自然科学，后来为了更好地结合革命活动转而研究国民经济学。一八九七年她完成了学业之后就迁居德国，以便在这里的波兰工人中间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但很快地她就卷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内斗争。一八九九年她为反对伯恩斯坦的论点而发表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就可以说是这一斗争的最初成果。

卢森堡首先是一位实干的革命家。她一生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因此也就不断受到反动势力的直接打击。一九〇四年，由于对国王的所谓不敬，她在茨维考坐了三个月的牢。一九〇五年年底，她从德国赶回华沙参加革命斗争，但在第二年三月她在那里同约吉希斯一道被捕，直到六月底才被战友们营救出来。一九〇七年卢森堡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这个工作使她能以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把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理论。卢森堡遇难后才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入门》就是她在党校时所编讲义的一部分。她的另一部代表作《资本积累论》也是党校工作时期的研究成果。

当时德国帝国主义特别热衷于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因此，在德国国内，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就成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刻不容缓的任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森堡又两次入狱。一九一五年二月卢森堡被捕，最初关押在柏林的巴尔尼姆施特拉斯妇女监狱，第二年二月获释；一九一六年七月卢森堡再次被捕，开头还是关押在巴尔尼姆施特拉斯妇女监狱，十月转到波森（波兹南），第二年七月又转到布雷斯劳，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时才重新获得自由。处于革命浪潮之中的卢森堡面临着把

分散的左派力量组织起来的迫切任务。就在这一年年底，在卢森堡的直接参加下，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成立了。另一方面，反革命势力也在极力策划对付她的阴谋。由于缺乏应有的警惕性，卢森堡和她的亲密战友李卜克内西一道终于遭到反革命势力的杀害。她遇难时还不到五十岁。

卢森堡通过一生的革命实践，证明自己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但长期以来，人们虽然承认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重大贡献，但她始终未能厕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行列。这是因为无论在她专攻的政治经济学范围内，还是在对待党的作用问题、农民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等方面，以及对待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方面，她都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有若干理论上的分歧。今天，经过数十年实践的检验，即使这些分歧证明卢森堡的看法确实有不妥之处或竟然是错误的，那也应当用她个人的经历和德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说明。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实际上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仅仅象先前那样给她扣上一些帽子实际上是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因与本书没有直接关系，就不拟在这里详加论述了。

如前所述，卢森堡就专业而论，是一位政治经济学专家。一八九七年她在苏黎世提出的博士论文就是论述波兰的工业发展的(该论文于次年出版了单行本)。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方面，作了不少有价值的贡献，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但对哲学问题，她的兴趣似乎不大，也没有什么系统的论述。在文学方面，她只发表过几篇类似文学评论的作品，但

很难说作过什么系统的研究。卢森堡无疑对文艺特别对诗歌，有深厚的爱好。在革命领袖中间，她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文艺气质的人，而这样的人在革命领袖中间还是不多的。她很早就受到有高度教养的家庭的熏陶，她家里的人都是德国诗人席勒的崇拜者。她从幼年时代就十分爱读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的作品，而且她自己也很早就开始写诗了。后来只是紧张的革命活动才使得她未能在文艺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卢森堡又是一位写文章的高手，比如她从狱中写给同志们的书信本身，有些就是十分优美的、感人至深的文艺作品。从书信中我们读到，甚至被打得淌血的水牛、毫无抵抗能力的小鸟的无声的死亡等等情景，都能引起这位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的无限同情。这些作品展示给我们一位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者的崇高形象。

卢森堡的波兰语和德语自不必说，她对俄语也是十分熟悉的。她早年在华沙就读的中学，就都是用俄语授课的。她能够直接阅读俄罗斯的文艺作品，并且后来在狱中还把柯罗连科的作品译成德语。要知道，这对卢森堡来说，是把一种外语译成另一种外语。此外，她还广泛阅读当时英法等国的文艺作品（如高尔斯华绥、洛蒂的著作）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她的看法（如对一般法国小说的看法）不免流于偏激。

革命家卢森堡在她同文艺的关系中，主要的特点就是，她始终把文艺同革命实践、革命的人道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她所喜爱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所作的估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托尔斯泰当然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但在托尔斯泰身上，她却特别重视这位作家的真诚、他的表里如一和对劳动人民的

无限同情，认为这正是所以使托尔斯泰成为伟大作家的决定性的东西。因此，不管托尔斯泰在世界观和理论方面有怎样的局限性和错误，她在评价这位作家时，始终认为“不能把艺术家同人、因而也就是同战士分离开来”。她还指出：“他（托尔斯泰——引者）所由汲取力量的源泉就是他的伟大人格，这种人格使这位真理的寻求者和斗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保有面对生活真理的勇气并且以《旧约》中先知的无畏和无比的诚实宣布自己的思想。”这些话正好概括了她对这位伟大作家的认识。在同样的意义上，对于她从小就崇拜的密茨凯维支，她认为他的《塔杜施先生》结束了他作为波兰民族歌手的地位，因为在这之后，他采取了消极退缩的态度，脱离了争取民族独立、争取进步的斗争。对她翻译其作品的俄国作家柯罗连科，她也是从他始终对人民无比忠诚，脚踏实地地为人民做事这一点加以评述的。柯罗连科竟然是这样一个诚实的人：他宁肯再去过四年的流放生活，也不愿哪怕仅仅是在表面上向沙皇政府宣誓效忠。卢森堡指出，如果说这是一种“徒劳的示威”，但这种示威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却是不能缺少的。这很自然地使我们想到张志新、遇罗克这样一些位威武不能屈的烈士，他们不正是以其极度的诚实和忠于真理的精神表现出了真正革命者的伟大气概么？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冒着风险去祭奠、去题诗的志士仁人们不也是做着老成持重的先生们决不肯做的同样的事情么？这些硬骨头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作用能够说是微不足道，甚至是徒劳的么？事实证明，柯罗连科的四年流放生活也并不是白白度过的，这使他更深刻地扎根于人民之中，从中吸取了无限的养分，因而他从流放地回来后发表的作品，立刻使他成为俄罗斯的第一流作家。他同人民的关系更亲密了，他的性格也变得更加深沉、更加成熟了。

卢森堡认为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应当是一致的。作为一位战斗的、乐观的革命家，她喜欢自然、朴素、健康、开朗的作品，讨厌感伤和颓废。她虽然长于宣传鼓动，但她反对直接用艺术作品进行说教，比如，她就说过这样的话：“在小说里，我看的不是倾向，而是艺术价值。”在另一个地方，她还强调了世界观的重要性：“对于这些作家，我有点讨厌他们有本领出色地完美地掌握形式，掌握诗的技巧，但同时却缺乏伟大而崇高的世界观，这确是事实。这种不调和的情况在我的思想中显得如此空虚，以致美丽的外形在我心目中变成了丑脸……”

总地说来，卢森堡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虽然不多，但这却是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它们反映了一位革命斗士同文学的真诚、素朴的关系。这些文献即使在几十年后，读了依然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动人。它们使人振奋，使人向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要把它们介绍过来的意义。但愿我们能深刻接受过去三十年，特别是十年动乱中文艺界中“左”的教训，永远不要再搞那些打棍子、扣帽子之类野蛮横暴、专门伤害自己人的蠢事。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再担心有谁专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革命先烈的作品当作教条拿来吓唬或迫害别人（这实际上是败坏他们的声誉！），而是从这些作品中吸收营养，得到启发，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思考、钻研并解决问题，那就是我们真诚期望的了。

目 录

译者引言	1
亚当·密茨凯维支	1
格列布·乌斯宾斯基	9
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优利安	16
社会民主党的优利安	22
社会思想家托尔斯泰	24
托尔斯泰	37
〈关于梅林的《席勒》一文〉	44
〈关于托尔斯泰逝世后出版的作品〉	49
〈柯罗连科：《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译序〉	56

书信摘录

致玛蒂尔妲·武尔姆	96
致汉斯·狄芬巴赫	106
致盖尔特鲁妲·兹洛特科	123
致卡尔和露惹莎·考茨基	124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	149
致玛尔塔·罗森包姆	165
致克拉拉·蔡特金	168

致康斯坦丁·蔡特金.....	178
致无名氏.....	202

亚当·密茨凯维支*

如果说波兰除了在十二月廿四日纪念其诞生一百周年的那位诗人之外，在自己的文学家当中举不出任何别的人来，那么它却有充分的权利要求同文化上先进的各民族一道，在世界文学中享有荣誉的地位。

亚当·密茨凯维支不仅是波兰最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波兰的民族的和思想的历史是同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波兰，密茨凯维支的名字意味着整整一个时代。

尽管对波兰的瓜分^①使它处于完全是新的政治条件之下，然而在本世纪^②的前二十年当中，国家的精神的和文化的生活在本质上依然是旧的贵族共和国后期的继续。贵族这时依然是统治阶级，豪门地主则是社会的思想领袖，劳役租制则是它的农业的物质基础。精神的和政治的生活还不是集中于城市，而是集中于农村，集中于以血统为联系纽带的贵族庄园。

在合并于俄国的地区里，对于豪门地主和上层波兰贵族来

* 本文最初发表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莱比锡人民报》第二九八号上。作者说她力图联系民族主义的历史来探讨密茨凯维支的著作，而不是象贝尔那样，只研究他的哲学观点。

① 由于一七七二，一七九三和一七九五年对波兰的三次瓜分，它的西部地区为普鲁士所占领，加里西亚归于奥地利，而其余部分（波兰王国）则于一八一五年同俄国合并。

② 指十九世纪。

说，这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时期。大部分的旧制度——特别是立陶宛的农奴制——保存下来了，一切官职、甚至俄国的许多官职，都由波兰人来担任。当时一个名叫卡·科兹米扬^①的人写道：“普遍的看法是：就某些方面来说，现在我们的日子比波兰独立的时候还要好过。在祖国波兰给予我们的东西当中我们取得了一大部分，而且我们摆脱了农民起义带给我们的负担和危险。波兰这个国家虽然没有了，但我们还住在波兰，而且我们还是波兰人。”

贵族的以血统为纽带的庄园在这一时期依旧保持着精神和文学生活中心的意义。豪门地主依旧是艺术的保护者，而艺术——特别是文学——部分地是佩剑的或是穿着黑色神父外袍的“出身高贵的”文艺爱好者的消遣娱乐之物，部分地则是表达宫廷奴才作风的一种形式。

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人们是不会十分向往本民族的过去的。相反的，精神生活的主题、它的全部特点勿宁说是对外国人的模仿。当时的波兰所由汲取的源泉首先是拿破仑的法国。然而即使是在法国本国，当时也只是那种撒着发粉的假古典主义踩着高底靴在那里招摇，而从法国移植到波兰的不过是这种假古典主义的微弱反响而已。它的突出的特征是油滑、夸张而又空洞的形式，完全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内在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

但是在当时波兰的社会内部，从一开始就已在酝酿着一次

^① 卡耶坦·科兹米扬(1771—1856)，保守的、拥护古典主义的波兰诗人，他本身又是高级官吏和参议员。他的最重要的诗作《波兰的地主》和《斯提芳·契尔涅茨基》是模仿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的。

变革。拿破仑一八〇七年在华沙大公国之取消农奴制(没有减轻徭役和调整同地主的土地关系)、Code Civil^①的实施、手工工厂的建立、农业的变革(采用轮作制)、新的官僚管理制度、租税负担的大大加重和国家垄断制——所有这一切都是使社会发生深刻动荡并且为新的阶级斗争准备了土壤的各种不同的激发力量。

正当掌握了全部行政权力的豪门地主——还有当时的资本代表人物和他们在一起——对当时的制度即俄国保持忠诚的时候,在贵族和特别是小地主、贫民群众当中,一个强大的反对派成长起来了。这一反对派当然带有民族色彩,他们并且转向过去以寻求他们的理想。一八三一年的起义^②成熟了。

与此同时,精神生活的条件也改变了。在旧的生活准则被摧毁之后,并非富有的贵族不得不为自己寻求新的活动场所。既然现代的官僚制度把专门的教育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学校和新闻业对贵族来说就有了另一种意义;因此在波兰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贵族知识分子。文学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象先前对豪门贵族那样,是一种消遣,一种宫廷服务的形式,而是一种职业了。由于“出身高贵的”(这是波兰的说法)两个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同和意图各异,以这些下层小地主贵族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思想流派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

如果说占主导地位的贵族统治者的官方文学是重复法国艺

① Code Civil, 即拿破仑制订的《民法典》,今天它仍是资产阶级权利的典型表现。

②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华沙的一次军事哗变演变成反对沙皇的外国统治的一次人民起义。一八三一年九月七日,沙皇军队攻占华沙,起义随即被镇压下去。

术的伪古典题材的话，那末下层贵族反对派的文学就诉诸民族的题材；正当古典主义的文学颂扬当代的时候，民族文学则颂扬过去：这种文学心目中的过去是笼罩在神秘的光辉里，并且为它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形式，把德国的浪漫主义当作自己的典范。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就是被带到艺术领域内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经济和政治中都发生了冲突并且在起义战斗中变成刀剑声和射击声。但是，如果说在格罗霍夫和布拉格的战场上是统治制度的代表者即俄国当局取得了胜利的话，那末在思想的战斗中，他们却失败了。正当着“古典主义者”从自己的队伍中只能拿出一群灰色的平庸人物，形式呆板的工匠的时候，浪漫主义却象是变魔术一样地一夜之间从社会内部得到了许多年轻的具有非凡天才的人物——在波兰文学天穹的晨曦中最明亮的一颗星就是强大的天才亚当·密茨凯维支。

整整一代的领袖和喉舌密茨凯维支按照他自己所代表的思想流派，成为抒情的和史诗的诗人、憧憬和热爱祖国的歌手，同时又成为一位客观地描绘民族历史的艺术家。

他为这两种体裁的诗歌留下了不朽纪念的两部主要作品就是《先人祭》(Dziady)和《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波兰文学从来不曾——无论在先前还是以后——象在《先人祭》里那样，以这样强烈的感情，这样的深度、这样巨大的胆略来讲话。在这里，诗人充分认识到自己对祖国的爱的力量，而向世界的创造者提出挑战。无论是先前还是以后，绚烂的古老的贵族波兰，都不曾被描绘得象在《塔杜施先生》这部完美的杰作中那样。

谦虚到天真程度的诗人认为，他能够创作出一种同歌德的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相近似的东西，因为在起初，他是把歌德的作品当作典范的。但是这种比较只能引起读者的微笑，因为

把歌德的史诗同《塔杜施先生》相比，这种比较之无根据有如（例如说）同《伊利亚特》相比。毫无疑问，密茨凯维支的主要作品是可以同《伊利亚特》并列的，尽管其中也有同《堂吉珂德》相通的某种东西。它描绘的并不是象荷马时期的那样一个社会，那个社会精力充沛并且在达到充分的发展之后，好像是静观自得地在那里晒太阳；相反，它所表现的是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一个注定要灭亡的社会。因此，他的描述虽然没有破坏古典的宁静和艺术的客观性，却有一点悲哀的讽刺，有一点讽刺的同时又是和解的幽默，正好象用夕阳的玫瑰色的余辉照亮了整个巨大的画面。

这样，密茨凯维支的诗歌的出现对整个波兰社会有启发作用就不足为奇了。在他最初的一些作品、特别是他的杰作《青春颂》问世之后（在这一作品里，诗人在锤击声一样的诗节里，以动人心弦的少年热情，号召自己的整个一代把力量结合起来，“推动发霉的地球，使它走到新的轨道上去。”），密茨凯维支立刻就成了全部思想生活的中心，无限崇拜的对象（当然只是青年们对他如此）。他只是属于青年的，就好象波兰历史上的当时是属于青年的一样。诗人的天才甚至对于相邻的俄国都发生了如此强烈的影响，以致当密茨凯维支被流放到那里去的时候，两个首都的知识分子把他抬了起来，而且他在那里交了许多知心的朋友，特别是在未来的十二月党人^①中间。

然而，就在浪漫主义称颂过去的时候，不回头的现实却走上

^① 被沙皇当局从波兰流放的密茨凯维支受到俄国文学界和进步人士的热情欢迎。被流放的诗人的朋友有：H·波列沃伊、奇列耶夫斯基兄弟、维杰姆斯基、普希金，而在十二月党人当中则有雷列耶夫和别斯图热夫。密茨凯维支后来在《先人祭》中就提到过这两个人。

了自己的新的道路，并且这一道路日益偏离密茨凯维支和他的学派的理想。他的战友们给自己提出了一项在历史上无法完成的任务。既然现实日益沉重地打击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没有别的办法——只要它不愿否定自己——而只好更深地沉湎于幻想的世界，更坚决地把现实消灭在自己的空想里。在民族运动被消灭之后，在浪漫主义的发展中，下一个阶段理所当然的就是神秘主义了。

就和自己在文艺界的其他许多兄弟一样，密茨凯维支也是在一个不会带来任何成果的、虚幻的宗教神秘主义的港湾中结束了自己的行程。而这不仅是思想方面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类诗歌的破产。起义失败之后不久，波兰民族主义的歌手就沉默了；在这之后诗人的大约二十年的生涯当中（他死于一八五五年），密茨凯维支几乎什么诗歌都没有写。《塔杜施先生》仍然是他最后的一部完美的作品。

它也是波兰民族主义的最后一部杰出的作品。在第二次失败^①（1861—1863）之后，在波兰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次由于消灭自然经济和大工业的出现而引起的变革。正好象经过魔杖的一挥那样，全国的整个内部和外部的生活都改变得无法辨认了。今天的波兰同密茨凯维支进行创作时的那个波兰很少共通之处，而同他歌颂的那个波兰就更少共通之处了——不会比同任何其他外国相比时为多。

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道具的原野、苍翠的森林和草地被推

^① 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间农民骚动的浪潮于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波兰王国、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部分引起了反对民族与社会压迫的人民起义，起义于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四年间遭到血腥的镇压，因为没有坚强的民族领导。